

越是艰苦的地方，越需要我们

——中国儿艺走进青海互助县慰问演出

本报记者 王立元

9月8日，在地处海拔2700米的青海省互助县东沟乡塘拉小学，天空下起了雨，本就只有10度的天气变得更加湿冷。这样的情况下，儿童剧《小吉普·变变变》是继续演还是暂停，让演出组织者犯了难。最终，穿着短袖演出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没有任何犹豫，他们克服高原反应，在雨中依然精神饱满地演出。9月7日至10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走进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进行温暖童心慰问演出。《特殊作业》和《小吉普·变变变》在4天时间演出14场，2万多名高原上的孩子看到了儿童剧。

我们应该更早些来这里

互助土族自治县北倚祁连山脉，距北京约2000公里，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为了让互助县乡村和山里的孩子都有机会接触儿童剧，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带来大剧场剧目《特殊作业》和小剧场剧目《小吉普·变变变》。

“你们看过儿童剧吗？”开演前，带队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李小刚站在台上问大家。“没有。”台下的孩子和老师一起喊。“抱歉，我们应该更早些



舞剧《诺玛阿美》：再现哈尼族的迁徙史

本报讯（记者刘茜）“心在梦在，爱在家在，哈尼人走过千山万水走到红河边，梦中的诺玛阿美在眼前……”我国首部哈尼族舞剧《诺玛阿美》近日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首演。感人肺腑的剧情故事、美轮美奂的舞台呈现，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诺玛阿美”在哈尼族语言里意为最美家园。该剧取材于红河哈尼族口述叙事长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以哈尼族迁徙为背景，通过哈尼族原来的巫师贝玛的讲述，凭借该族独有的舞蹈语汇，展现哈尼族历经苦难寻找到心中的“诺玛阿美”——红河南岸的艰辛历程，再现了哈尼族躬耕梯田、追求幸福生活的历史画卷，颂扬了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该剧由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民族文化工作团团长周楚栋编创，创作过舞剧《红高粱》等作品的王珂、许锐共同担任总导演，青年舞蹈家刘迦和骆文博领衔主演。

该剧创作起源于2013年底，是结合中央和云南省委、省政府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相关要求，由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文化工作团精心创作演出的。该团已成立64年，其歌、乐、舞的创作一直扎根少数民族艺术土壤。许锐介绍，他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哈尼阿培聪坡坡》，感觉很好。它讲述了哈尼族历史上的多次迁徙，有人物、有故事，所以选定了这个题材。但是，他也同时感慨民族民间舞剧有不少创作难点。“民族民间舞剧会受到原有的舞蹈语汇、民族传统

小时候，父亲还给我多次讲述过上世纪20年代，傅景阳领导大连中华工学会和大连铁路工厂工人罢工的故事，这是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的。他总是在确认没有外人的情况下，放低声音娓娓讲来，而我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感到这位工人领袖很了不起，也很神秘。解放后，我才知道，那时大连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而且领导过几次大的斗争。傅景阳就是第一批在大连被发展的共产党员。日寇统治大连时期，党的地下组织曾4次遭到大破坏。到了日寇统治后期，大连的中国老百姓私下传颂着山东八路军神出鬼没打日本的事迹。人们说到八路军时往往不说话，仅伸出一只手做一个“八”字，大家就心领神会了。

我在日本人办的学校上学

日本统治大连时，推行的是为其统治服务的殖民地教育。当时，它对中国人和日本人搞的是两种教育：对日本人实行的是灌输殖民主义思想的特殊教育，对中国人实行的则是灌输愚民思想的奴化教育。我上的小学是面向日本子弟的“大连霞寻常小学校”，后改名为“大连霞国民学校”。我上这个学校纯系偶然。小时候我很顽皮，一天我惹了祸，遭到父亲责打。恰巧这时，老邻居也是老主顾王某来我家店铺买东西，看到这一情景，便对我父亲说：“我的侄子在‘满铁’的一所幼儿园学习已经一年了。你为何不把孩子送去呢？”父亲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怎么可以把孩子送到那样的地方？”王某说：“我替你说说看。”后来，这事果然成了。我在那所幼儿园待了两年，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园长就把我推荐到附近的“霞寻常小学校”。6年毕业后要升中学。那时已经取消升学考试，我便直接进了同样面向日本学生的“大连中学校”。这所学校里学生绝大多数是日本人，只有少数是中国人。

那时候，我在家里讲中国话，在学校则用日语上课。但随着年龄增长，学校

演员们说：“我们去过海拔4000米的西藏慰问演出，也去过烈日炎炎的戈壁滩上进行公益演出，我们知道，越是艰苦的地方，孩子们越需要我们。”

9月10日，《小吉普·变变变》剧组一大早就出发了，这一天的任务是到互助县最远的一个藏族乡——巴扎乡演出。巴扎乡在群山怀抱之中，地广人稀，巴扎乡中心学校从一年级到九年级才有350名学生，有些孩子上学要走路两个小时。

尽管是第一次看儿童剧，演员们滑稽幽默的表演很快把孩子们逗得哈哈大笑，更引发了他们对神奇“魔法”的兴趣：他们伸长脖子、瞪大眼睛盯着演员手中的表演道具——萝卜、毛巾、小勺等常见的生活物品，琢磨着它们如何一下子变成了鸭子、鹤和小熊。

演出结束后，孩子们不愿离去，他们站在操场上依依不舍地看着《小吉普·变变变》剧组舞美人员拆台装车。一个孩子问：“小吉普里的消防队员去哪儿了？还会再来演出吗？”那好奇的眼神中流露出恋恋不舍。

让更多孩子看到儿童剧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艺术家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让全中国每一个孩子都能看到儿童剧。

自2007年起，通过“经典儿童剧走进西部”“文化下乡”等活动，中国儿艺努力践行着这个梦想，演出足迹已经遍

布新疆、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四川等12个省区市，为西部地区的学校、福利院、社区公益演出500多场，50余万名边远地区的孩子因此接触到了高质量的舞台艺术。

此次，为了让互助县更多的孩子看上一场儿童剧，中国儿艺的两个剧组以每天演出2场至3场的频次超负荷运转。即便这样，互助县中小学校的学生中也只有一小部分能看上演出，很多学校的校长在看完演出后表达了让剧组去他们学校演一场的愿望。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尹晓东表示：“在众多的艺术品种中，唯有儿童剧是以观众对象命名的品种。因为观众的特殊性，中国儿艺因此多了一份责任。如果说学校教育是传授知识与技能，作用于孩子的头脑，而艺术则是通过精神的陶冶，作用于孩子的心灵。正是基于这种责任和使命，中国儿艺始终把创作和演出更多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不断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首要任务。”

面对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孩子大多有意愿却没有能力花钱走进儿童剧场的现状，2014年，尹晓东提出将公益演出常态化，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一年演出场次达到600多场的情况下，依然创造机会、挤出时间，到偏远的没有演过儿童剧的地方进行公益演出。今年以来，该剧院已经开展了近50场公益演出。

协会副主席于平在观看《诺玛阿美》后对该剧给予充分肯定。国家一级编导疆嘎说：“这部剧的成功演出解决了民族题材的舞剧如何叙述的问题，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在创作手法上，《诺玛阿美》也做到了精心构思、巧妙编织，将舞蹈语言融合在歌、舞、礼、乐、诗等艺术形式中。此外，舞剧还展现了哈尼族原始的祭祀仪式和四季生产等有独特民族风情的活动，并结合现代舞台光电的运用，赋予舞剧丰富的内涵。北京舞蹈学院院长郭磊说：“《诺玛阿美》的舞台、灯光、演员等所组合表现出的效果，让人感受到史诗般的震撼。”于平说：“舞剧自始至终有一种惊心动魄的视听冲击。音乐、舞台、舞蹈的综合效应，能让人感觉到民族性格的凝聚力 and 民族精神的坚韧性。”云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孙晋昆表示：“这部舞剧结构凝练，叙述清晰，它的交响性和立体性为云南舞剧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等限制，所以往往以晚会展示为主，舞剧题材很少，突出舞剧的史诗性、戏剧性、人物性也更加困难。”许锐说。

创作中，王珂和许锐共同意识到并坚持着一个原则，那就是舞剧要为“剧”服务、为“人物”服务。“为了把哈尼族舞蹈本身的特点和民族色彩融入剧目，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加入了大段的棕扇舞、铓鼓舞等。棕扇舞在主人公去世的时候出现，因为它本身就是哈尼族祭祀亡灵时跳的，而铓鼓舞是在祭祀的时候跳，在剧中也正好和人物情感融合在一起。”

“《诺玛阿美》表现了哈尼族寻找、建设美好家园的过程，更传递了一种必须抵达的信念。这部舞剧体现了为民族请命的文化担当。”中国文艺评论家

里灌翰的一套宣扬“大日本帝国”以及歧视、贬低或诬蔑中国的思想，常常使我感到苦闷和不是滋味，对学校里教的那一套，有时感到格格不入甚至反感。

最突出的是学校里上“修身课”。从小学到中学，每周两课，都安排在上午的第一堂，可见当局是多么重视这一科目。我在中学时，外号“狐狸”的池田校长专门教“修身”。每次一上来，他就让学生闭目打坐，鼓吹一通“皇国思想”“万世一系”“忠君爱国”“大和民族优越”“圣战必胜”“武运长久”等谬论。我坐在课堂里，心里很烦，思想常常开小差，根本不认真听。

还有，每天早晨学校举行“朝会”，要求全校学生面朝东京“皇宫”方向行90度的“最敬礼”，口令是“东方遥拜，最敬礼”！每当这时，我在心里默念“东方要败”！其实，当时生活在大连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心里都是这样想的。同样是“朝会”，学校还有一着“与众不同”，就是做早操时，不管五冬六夏，要学生一律把上衣脱光。夏天可以，冬天寒风刺骨，真是难熬。为了让学生接受军事训练，学校里还配备有日本军官。这种“教练课”是日本中学的必修课。当局通过这些做法，企图在日本学生中培育“大和魂”，灌输法西斯思想。

他们对学生的管理也是法西斯式的。教数学的铃木编号“w”，这是学生们按他头发前沿的形状奉送的名字，他的另一个绰号是“疯狗”。他教的数学，学生常常听不懂，不懂就要受体罚。我的数学成绩不佳，有时被叫到黑板前演算，算错了，也挨过拳头。“w”担任班主任的那个班，有名中国同学“L”，一天上学时忘记带历史课作业本便回家去取。等返回学校时，“朝会”已开始。迟到的学生被值班生带到列好的队伍后面站着。那一天说来也巧，“w”那个班级的学生迟到的最多，在操场上很是打眼。“w”一看，火冒三丈。“朝会”一结束，“w”急不可耐地走到迟到的同学面前，每人“赏”一记耳光。但是，唯独对“L”“罪加一等”“严惩不贷”，“L”的头部、面

部遭到暴风雨般的猛烈袭击。那时，我暗暗想：为什么偏偏对中国同学这样残酷呢？这不是对中国人的歧视是什么？

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投降了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前，我在学校里也能感受到日本人已惶惶不可终日。那一年，我上中学二年级。一开学，就发现很多老师不见了。后来听说尽管他们年纪较大，但由于兵员奇缺，也被征去当兵了。学校里虽然来了几个生面孔的老师，但他们也不正经上课，天天强迫学生“勤劳奉仕”——挖“防空”用的“蓄水池”。过了一些日子，班级里有几个狂热的“忠于皇国”的日本学生也突然不见了，他们竟去投考“预科练”的少年航空兵，准备充当“炮灰”。8月9日，苏联向日本宣战，出兵东北，学校当局又拉二年级的学生去挖企图阻挡苏军坦克的所谓“战车壕”。说实在的，无论是“蓄水池”还是“战车壕”，都不是儿戏，根本无济于事。

8月15日上午，我们正在工地劳动，突然接到通知，要我们列队到附近的下藤小学校操场听中午的“重大广播”。中午，从扩音器里传出了刺耳的杂音，间或听见有一个人在讲话，但不知是谁在讲什么。由于校方要求学生都低下头听广播，所以猜测是日本天皇讲话。我们稀里糊涂地听完了广播，又列队返回工地吃午饭。有几个日本学生去本校打热水，听到新闻广播，知道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他们慌慌张张地跑回来，告诉大家这个消息。我们几个中国学生真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小日本，这下子可完蛋了。我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但是，当时日本的武装还没有被解除，我们只能把无比的喜悦藏在心里，还不敢暴露出来。该死的“勤劳奉仕”，立即收了摊儿。

从此，我永远告别了日本殖民者办的大连中学。大连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人民重见天日。（黄悦整理）

内蒙古召开长城保护工作会议

本报讯（驻内蒙古记者阿勒得尔图）9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召开全区长城保护工作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刘新乐出席会议，并与各盟市相关负责人签订了《长城保护工作责任状》。

刘新乐说，加强长城保护是党中央、国务院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全区各盟市和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长城保护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认识长城保护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遵循“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切实开展好长城保护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和有关部门将坚决纠正破坏文物、违法建设、

过度开发等违法行为，严肃处理涉案单位和责任人员。此外，为发挥基层长城保护员的作用，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加强长城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在每个长城沿线旗县（市、区）的重点苏木乡镇、嘎查村，建立一定数量的长城保护工作站，由长城保护员对长城进行定期、定点、定时的常态化巡查、看护。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厅长佟国强强调，各盟市要及时研究部署，按照《长城保护工作责任状》加强对长城保护工作的领导，贯彻落实《长城保护条例》和《内蒙古自治区加强长城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规定的“整体保护、分段管理”原则，把长城保护的职责层层分解纳入责任目标。

中国音协举办音乐创作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罗云川）9月11日，中国音乐家协会在北京举办全国音乐创作座谈会。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傅庚辰，中国音协主席叶小钢，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副主席徐沛东等参加座谈会。座谈会由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韩新安主持。

座谈会上，傅庚辰结合自身近70年的音乐生涯谈了创作体会。他说，音乐创作要吃透作品的主题思想、吃透作品的艺术风格。在创作中，现代技法中国化、音乐语言民族

化、音乐结构科学化是应该遵循的三个规律。同时，音乐创作应雅俗共赏，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创作。

叶小钢表示，对于音乐创作而言，创新是竞争力，内容是竞争力。音乐工作者应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有个性的作品，应加强民族器乐创作，将西方音乐类型和技法与中华文化精神相结合，并重视音乐的传播渠道，把中国音乐推向世界。“文艺要真善美，不然老百姓不理你。”徐沛东表示，创作是立身之本，音乐创作者要成为时代文艺的引领者。

中俄油画创作高研班结业展将办

本报讯 9月19日至10月7日，中俄油画艺术创作高级研修班结业展将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美术馆、陈列馆和美门艺术馆等的12个展厅集中展出。本次展览将汇聚中俄油画艺术创作高级研修班41位学员的300余幅优秀作品，以及13位中俄导师的30余幅作品。

迄今历时一年的中俄油画艺术创作高级研修班，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国家外国专家局的重点引智

项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和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联合举办。作为全面真实展现此次高级研修班一年来的创作研究成果的重要展示，该展将从艺术作品的研究性、写生性和创作性三部分呈现，展览作品均是研修班学员完成的高水平结业作品，是基于大量的外出写生、课题研究和个人艺术累积而创作完成的。（艺文）

北京陈独秀旧居修缮完工

本报讯（记者陈径舟）今年是新文化运动爆发100周年，亦是《新青年》杂志创刊100周年。9月14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箭杆胡同20号的陈独秀旧居修缮完工，《新青年》编辑部也将在旧居复内展。

1917年初，陈独秀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并迁居至箭杆胡同20号（原箭杆胡同9号），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从上海移至北京。陈独秀旧居于2001年被确立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虽是文保单位，但由于历史原因，旧居还住着6户人家22位居民，且院内年久失修、私搭乱建，经建筑部门鉴定属于危

房，存在很大安全隐患。2013年初，东城区将陈独秀旧居腾退修缮工程纳入名城保护重点项目，并于今年竣工。

在旧居腾退修缮完工仪式上，陈独秀孙女陈红希望北京的陈独秀旧居摒弃浮华，真实地反映陈独秀当年朴素艰辛的生活状态，并能开展一些文史交流与讲座。陈独秀旧居的修缮、保护和利用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的肯定，他说：“东城区探索旧居保护与社区结合，充分发挥了它的社会功能。名人故居不能脱离百姓和社区而成为高雅殿堂，我们要做的是真实还原一段历史、保存一段记忆。”

2015中国·五当召文化高峰论坛举办

本报讯（记者王晋军）9月11日至13日，2015中国·五当召文化高峰论坛在内蒙古包头市石拐区喜桂图新区举办。近百名国内文化旅游专家学者、景区负责人围绕“‘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五当召文化力量诠释”的主题，挖掘五当深厚的文化旅游资源。本次论坛由包头市人民政府、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国家文化产业规划研究院、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亚太旅游联合会、内蒙古旅游景区协会主办，包头市石拐区委、区政

府承办。

论坛围绕五当召宗教与历史文化的价值定位、藏传佛教与草原文化融合碰撞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探讨、国内5A级佛教景区及其他国内知名景区的管理经验探索与交流、五当召文化旅游开发在石拐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的价值与地位、“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五当召旅游定位研究、五当召如何走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之路6个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

藏羌文化铺就阿坝文化旅游发展之路

（上接第一版）

统计数据显示，阿坝州2014年接待游客2876.1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42.74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5.6%、24.1%。其中，入境游客14.83万人次，实现外汇收入3197.38万美元，分别增长15.9%和13.1%；九寨沟进出港航班15789架次，旅客吞吐量170.07万人次，分别增长10.0%和16.5%。

阿坝旅游业为何有今天的蓬勃发展景象？阿坝州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原副局长庄春辉曾撰文指出，主要因为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时就将旅游业定位为主导产业和优先产业，并在重建过程中重视生态恢复，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注重可持续发展，为阿

坝旅游业的包容性增长和再生性跨越创造了条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所在。

“‘神奇阿坝·藏羌文化’的旅游主题形象逐渐深入人心。”阿坝州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何志芬说。这位今年7月履新的“70后”藏族女性，虽然自谦“不太懂文化产业”，但作为一名文化系统工作人员，深谙阿坝州委、州政府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的战略目标：2016年，力争实现年接待游客2300万人次左右，入境游客突破1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250亿元左右。就这一点而言，文化与旅游在阿坝是天然融合的。